

我的老家是重庆远郊区北碚的一个镇，叫歇马场。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儿，好像听老辈人说，是关云长路过这里，将兵马在这里歇了一夜，故得名。后来我读三国，知道张飞到过重庆，关羽未曾入川，他镇守荆州，败走麦城，死在江东。可能是别的什么蜀中人干的事，安在了大名鼎鼎的关公头上了。

附近还有一个地名叫“落凤坡”，与凤雏庞统有没有关系就不清楚了。不过，我记事的时候，歇马场就成了军校所在地。

北碚、歇马、青木关，在由东向西的一条五十华里长的大川里，由一条公路相连。歇马居中，镇的东边是军校，占地好几百亩，东西长，南北窄，光是那个大操场，举办上万人的运动会也绰绰有余。

最开始时叫“速成中学”，就是给经过战争的军官补习文化，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中学水平。军官们有的经过解放战争，有的经过抗日战争，还有走过二万五

# 少年学军

蒋元明

千里长征的，个个都是功臣，还有著名的战斗英雄。他们是姑娘们追求的对象，也是少年们崇拜的偶像。

每天早上，滴滴答答的军号声就传到耳朵里，声音清脆悦耳，划破黎明的寂静。那时农村，一般都是靠公鸡报晓，可我们不是。记得小时候，早上大人叫小孩：军号都响过了，还不起床！我们一天要听几遍军号，起床、出操、吃饭、上课、熄灯……我们是在军号声中长大的。

军校和村子之间有一座小山头，叫尖坡顶。一有空，我们就爬上山头，军营就尽收眼底。军官们集合、操练、整队唱歌，一清二楚。军校周围后来用竹子编成围墙，但有的地方开有口子，方便进出，所以我们经常穿过军营，尤其是晚上大操场放电影，周围的老百姓，特别是年轻人、小孩子蜂拥而去；一见银幕上“八一五星”闪闪，就欢呼，知道

又是打仗的片子，能过把瘾。《白毛女》《钢铁战士》《上甘岭》等等都是在军营里看的。

最有吸引力的是军人打靶。尖坡顶南边路两边一戒严，步枪、手枪、冲锋枪就响起来，惊心动魄。我们趴在地上，子弹有时从头顶上空鸣叫着飞过，很紧张，很刺激，很过瘾。等到戒严一解除，我们就冲进靶场，拣弹壳，挖弹头。人人都有收获。谁的战利品多，谁就值得炫耀。有时部队演习也到院子周围的山坡上，有时就在院子里开饭。这就好比电影演到家门口了，小孩们是部队走到哪里就追到哪里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身上的枪。

耳濡目染，村里的孩子也军事化了。院子旁边的一片片竹林成了“司令部”，有司令、政委、参谋长，还有团长营长，他们都扛着肩章，肩章上的“星”是用烟盒里的锡箔纸做的，银光闪闪，很像回事；屁股上吊着木头做的驳壳枪，神气活现；晚上站岗放哨，还有口令。那枪不都是假的，有的上边挖了槽，安上弹壳，填上火药，一扣扳机，还真能打响。可惜那时我还小，只能和几个小屁孩儿跟在这些“尉官校官”后边跑，干一些搬石头垒工事、通风报信的事儿。

领头的叫春儿，是个孤儿，没爹没娘，也没上学，一个人住一间房，无人管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他的家就成了院子里小孩们的乐园，他的床可以随便躺，脏脚丫子也没关系。春儿有号召力，上中学的孩子都听他的，人很聪明，点子也多。电影看多了，他就把连环画上的打仗故事用玻璃片画下来，做一个木头盒子，用手电一照，图像就印在墙上的白布上，再配上解说，就成了幻灯片。只要一放，屋里就挤满了人。后来，他又用大米跟院子里的主妇换钱，在房顶上架起天线，安上矿石收音机。小针那么一拨，耳机里就能听到美妙的歌声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，神奇极了。春儿的屋里经常高朋满座，深夜喧哗，左邻右舍又气又无奈；大人们只要找不到小孩，到春儿的屋里去，一找一个准儿。春儿脾气好，又仗义，小孩们在家挨了打就躲到他这里来，晚上不走也行。他一出

时下文凭作假屡见不鲜。现在，这股歪风又吹到国外，假洋文凭飘洋过海来了。据悉，2006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办理了3万例国外学历学位认证，假洋文凭的比例较前几年又有所上升。仅在深圳，两年中又发现了近百个证书、文凭是不在认证范围内的。这几年，随着出国留学的大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，一些人在国外遇到的困难比国内更大，加上没人督促。为了回国后能向父母交代，并能找份好工作，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张假洋文凭。

一纸假洋文凭为用大焉哉！可以求职，可以骗钱，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，可以进高校当教授，可以申请科研经费，可以骗取爱情，甚至当领导，当总监。买假洋文凭是一种投资，虽然价格不菲，做一套一般在1000英镑左右，约合人民币15000元。但是，有投入，就会有产出，只要造假得逞，就可以设法把成本收回，一本至少可得千利。虽然有风险，但风险只是得利的十分之一或更少，冒一下也是值得的。

国内对假洋文凭的处置偏宽，甚至于见怪不怪，有人持一张假洋文凭来应聘，不作认证，立即奉若上宾，延请入室。这样一来，助长了假洋文凭的泛滥。毕业于西北师大的陈家中伪造了一张哈佛大学

的博士文凭，居然被浙江大学数学中心聘为研究员。但是，不久被发现了其真面目，学校仅作清退处理了事。作假处置不过如此，于是后继者络绎不绝。

相比之下，国外对假洋文凭拥有者的处理，要比国内严厉得多。

## 学历病态心理

吴兴人

在韩国，副教授的文凭造假，将面临起诉。现年35岁的申蓉雅，宣称自己拥有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的博士学位，因而被韩国首尔东国大学聘为艺术史学的副教授，并被看作韩国艺术界最具前途的艺术家之一，名利双收整整十年。最近，东国大学发现，申蓉雅不仅博士学位是假冒的，连学士和硕士学位都是假冒的。耶鲁大学说，他们从未录取过申蓉雅。申蓉雅的谎言被揭穿后，东国大学解雇了她，并委托检察机关调查此事，准备对她提出诉讼。另有消息说，光州艺术节的主办方已在7月12日取消了聘她为负责人。

东国大学和光州艺术节的主办方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。假冒学历，弄虚作假，欺骗了学校，欺骗了

学生，欺骗了公众，危害甚大。为人师表，如此作假，这不止是一个师德的问题，而且已触犯了法律。违法必究，对申蓉雅起诉是完全必要的。依法判她几年徒刑，也是完全必要的。唯有如此，方能杀一儆百，以儆效尤。因此，在国内，我建议对洋文凭的造假者，发现一个，查处一个。我们还要追究聘用假学历者的行政责任。浙江大学数学中心聘用陈家中的领导责任，也不能这样不了了之。此外，也要提出防止伪造学历的有效对策，建立一种学历的认证机制，从源头上堵塞住伪造学历的漏洞。

假洋文凭的风行一时，是“学历病态心理”造成的恶果，是过度看重外国文凭的结果。企图以不正常手段出人头地的社会风气，导致了假学位事件的频发。这给我们某些自己不识洋文、盲目崇敬洋文凭的人，也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：“海归派”里的南郭先生是大有人在的。我们可不要被一纸洋文凭蒙住了眼睛。判断一个海归人士有没有真本事，最要紧的，是看他有真才实学，有没有动手能力，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我们不要自己制造一道“学历壁垒”的南墙，弄得不好，南墙倒下来，把自己也压在里面。



金珠玉蕊(中国画)

王庄霄

时机和土壤，便会长出美妙的果实。王庄霄、许昂和余安娜三位老人的艺术成果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

霞光正灿烂，桑榆并未晚啊，我祝三位老前辈书画俱老，健康长寿。

王庄霄、许昂、余安娜画展在豫园听涛阁举办一个多月，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。一幅幅墨彩佳作似阵阵清风在心头掠过，驱散了溽暑带来的烦恼，人们惬意地流连在寒梅、傲兰、山水之间，与画家一道享受着丹青之乐……读者诸君可能要问：这王、许、余是何许人也？笔者会骄傲地告诉您：这三位都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离退休干部，热爱丹青的耄耋老人，拥有千名会员的上海老年书画会创始人。现在，他们用90幅作品说话了：桑榆更灿烂动人。

三位中，戎马一生的许昂是我部队的老领导，写得一手好字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后来听说对有君子之风的兰花情有独钟，从爱兰、种兰、咏兰、写兰到画兰，不仅开

了画展、出版画集，还应邀写出了画兰的技法专著。每当收到他画的兰花和飘逸的行书，我这个后生都会惊讶一阵子。老爷子的进取精神使我不敢问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”这次他展出的佳作阔笔潇洒、疏朗放逸，富有天趣，更见老到。“素装摇曳两芬芳，君子自来自惜葱筍。况是两家亲手笔，传来画箋细评章。”(王康题许昂画)

83岁的余安娜离休后20余年专心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学习。她年轻时在四川国立重庆师范美术科学习，曾师承张大千传人厉国香、伏文彦，后为黄宾虹传人王康乐的入室弟子，专攻山水，兼学花卉、人物。现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。这次她携数十幅作品参展，笔下的山水如《溪山烟云图》，

艺术之精神犹如高山之巅的太阳，它会使平庸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，它会让人脱离低级趣味而追求崇高理想的境界。或许，每个人的身上都具备艺术的潜能，一旦遇到合适的

回到文工团以后，这支军队认识到了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本质上的区别，其中许多人觉醒了，他们深深感觉到人与人的关系变了，他们梦寐以求的平等，在人民解放军中得到了。

这支军队的转变，是一个时空的跨越，脱胎换骨，由敌人变成了我们的同志。许多人编入了三野军乐队。嘹亮的军乐声，奏响了淮海大地、万里长江，直到解放上海、南京以至全中国。

明日刊登

一篇《忆陈老总看演出》。

## 押解路上险遭暗算

陈其

为解放战士。我不懂军乐，但对这样的特种部队，还有一点共同的语言，因为，我也是军队的文艺兵。我和他们平等相处，所以一整天的行军还比较顺利，没有发生一点问题，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整体。

过了沙河，说也真巧，我们

的某营部队和军区文工团就驻扎在河对岸的村庄里，真令我喜出望外，我总算顺利完成了一次特殊任务，把军乐队交给了领导。

但事后我了解到，行军之路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波澜不惊，我曾与死神擦肩而过。原来，在行进途中，隐藏在这支部队中的国民党政工人员曾策划在晚上宿营时，杀害

我，然后率队逃跑，我确信在那样的时空里，二十对一，谋杀我易如反掌。可是事与愿违，他丧失了谋杀的机遇，因为过了沙河，那个策划杀害我的政工人见有我荷枪部队在村外走动，吓得偷偷溜走了，因而我也免遭了一次生死劫难。这种暗

# 我的学生季塔连科

潘富恩

## 我的学生季塔连科



季塔连科归国后，中苏关系公开破裂，我与他从不通信，“文革”期间工宣队还专为此审讯我一番。20年后

的1980年，我突然接学校外办通知，

季塔连科作为苏联外交部的高级顾问，在北京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。

他要求来复旦看望我。见面时他热情地与我拥抱，说：“我以为您已不在人世，一直担心着……”后来我才知道，

他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、

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(现俄中友协主席)、科学院通讯院士，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顾问。临别时，他悄悄对我说：“两国和好时，一定请您来苏联做客！”

1989年12月中旬，应季塔连科之邀，去莫斯科作学术访问。到莫斯科机场已是半夜。

季塔连科到我住处，商量他主编的《中国哲学辞典》(俄文版)，聘请我为该书顾问，审阅有关条目(该书

1994年由俄国远东研究所出版)。他虽身居高官，但颇重旧谊，逢人便介绍“这位是我在中国留学时的导师”。

由前苏联而为俄罗斯后，季塔连科一切如常，现

仍任俄中友协主席，近

十年来前后三次访复旦。2000年初，他为我

一博士生的学位论文

《墨学研究》的出版写序。序中说“墨子的‘尚同’、‘尚贤’、‘兼相爱，交相利’的思想奠定了对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活动的道德评价基础。这种思想至今有其现实性并有世界意义。”季塔连科身为俄中友好协会主席，将墨子精神贯彻到了外交实践活动中。



1946年冬季，我军继续北伐。战役胜利之后，又发动了鲁南战役，全歼了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，解放了枣庄重镇，这次攻坚战的主攻任务交给了山东野战军8师24团。经过一夜的浴血奋战，伤亡惨重，终于攻克了枣庄。我和顾菊楼同志一道进行战地采访。此时正值那年的春节期间，天空还不时飘着鹅毛大雪，被炮火摧毁的敌人防线、残垣断壁，瓦砾遍地，被国民党中央军残害的老百姓，哭声震天。押解一队队伍战俘的我军战士，身挎着缴获来的战利品，面带微笑，顺街而过，胸前民工抬着我们的伤员，精心照料，整个城市在沸腾，参战部队和群众都沐浴在喜悦之中。战斗结束之后，我接受了